

# 第一章

## 历史人种和民族源流地理

### 第一节 历史时期中国人种发展和生理差异的地理特征

自从人猿揖别，猿人产生，人种便产生了。我们知道在遗传上具有共同体质特征的人类群体便是人种。但是不同的人种在其历史时期所创造的文化有怎样的特征呢？

一定地区的文化是一定的人种在特定的而又是在变化中的地理环境下创造的。我们可以说一定的文化现象与其地区的人种有很大的关系。作为生理学意义上的人类体质变化，包括人的大脑的发育成熟，肯定是与特定的区域文化有联系。但是怎样联系的，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很好地解决。当然，笔者在此提出这个问题并非有意在此解决这个问题，而只是在对西南区域文化的地理特征作探索之前，简单地分析一下西南地区历史时期人类体质特征的变化与地理环境变化的轨迹，启发更多的学者来思考这个问题，以期有贤者来解决这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现代人类学研究表明：人种的产生与进化与地理环境变化的关系十分密切，人的体质发育水平与地球自然环境的诸多因素的关系有规律可寻。对此，英国人类学家雷蒙德·弗思承认人类体质特征与环境有相关性。<sup>①</sup> 日本学者樋口清之认为日本每隔 300 年的气温周期变

<sup>①</sup> 雷蒙德·弗思《人文类型》 费孝通译 商务印书馆，1991 年版。

化就使日本人身高发生了变化，一般时值高温期的日本人身材高大而健壮。<sup>①</sup>又如研究表明，中国青年发育水平与地球纬度高度成显著正相关（ $P < 0.01$ ）。其中与气候的差异因素有十分重要的关系，发育水平与日照时间、年均温差成正相关，与温热程度成负相关，特别是发育水平与水质的关系十分明显。只是这种相关影响的机制还待进一步研究。<sup>②</sup>有的学者发现，太阳辐射与人的形态特征关系十分密切，各地水土中的化学物质及微量元素也对人的发育有较大的影响。<sup>③</sup>这样，我们可以看出，气候与人的体质特征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气候变化较长的时期内对人的体质特征肯定是有较大影响的。

早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智人阶段，中国北方的山顶洞人与南方的广西柳江人便形成十分典型的南北两种类型。华北的山顶洞人更接近于今蒙古利亚人种的北亚型，平均身高在 165.07 米左右；而广西柳江人可能更接近于今蒙古利亚人种的南亚型，平均身高只有 156.69 米。<sup>④</sup>由上可见旧石器时代晚期虽然可以长江为界分成南北两种人种类型，但黄河中游地区的人种除身高等因素外，许多体质特征也接近于今蒙古利亚人种的南亚型，如狭长颅型、高颅、低眶、阔鼻、齿槽突颌等。直到中国新石器时代，总的来看居民固有的体质特征也是呈现为南亚型，只是在南北的地区表现的程度不同而已。<sup>⑤</sup>我们知道，阔鼻、齿槽突颌等体质特征是与热带和亚热带的气候条件相适应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北方居民的体质特征有十分明显的蒙古利亚人种南亚类型特征，可能与当时该地区气候比现在更温暖湿润是相吻合的。如半坡遗址发掘的人类骨骼表明当地人类的体质特征与现代华南和南亚居民的体质特征十分接近，但同时半坡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得多也是为历史自然地理研究所证实了的。大汶口文化的居民体质特征更与蒙古利亚人种南亚型与波利尼亚混合型相近。<sup>⑥</sup>有研究表明，商周时期祭祀坑的人骨中便有属于南亚型的，<sup>⑦</sup>也可说明这个问题。

有学者认为中国黄河流域古代居民体质特征本为南亚型，后在夏商时期经过北亚化的过程后，在秦汉时期北亚化的南亚人又经东亚化的过程，后来黄河流域东亚化人南迁，使南

① 樋口清之《日本人与日本传统》王彦良、陈俊杰译 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 第 12 页～第 13 页。

② 林琬生《中国青年生长发育环境差异的研究》，《人类学学报》1990 年第 2 期。

③ 柳伯力《关于我国人体形态特征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分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1 年第 2 期。

④ 韩康信、潘其凤《古代中国人种研究》，《考古学报》1984 年第 2 期。张振标《现代中国人身高的变异》，《人类学学报》1988 年第 2 期。据赵桐茂 1987 年研究表明，从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型 GM 因子在不同人群的分布推测，古代亚洲居民分成南北两大类型人群。

陈德珍《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体质类型及继承关系》，《人类学学报》1986 年第 2 期。

⑥ 颜闾《大汶口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报告》，《考古学报》1972 年第 1 期。张振标《从野店人骨论山东三组新石器时代的种族类型》，《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8 卷（1980 年）第 1 期。

⑦ 韩康信、潘其凤《殷代人种问题考察》，《历史研究》1980 年第 2 期。

方南亚型居民东亚化了。<sup>①</sup> 其描绘的体质发展过程的具体时间还有待商榷，但其反映的南亚化特征消失的基本趋势是可信的。到了近代，华北地区人类体质上的南亚类型特征逐渐消失，除人类本身因劳作和食物因素进化的结果外，北方历史时期气候日趋干燥也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因为从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来看，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居民所处的气候环境确实比现在温暖湿润得多，当时的年均气温比现在高  $2^{\circ}\text{C}\sim 3^{\circ}\text{C}$  冬季 1 月平均气温比现在高  $3^{\circ}\text{C}\sim 5^{\circ}\text{C}$ ，关中地区和燕辽地区相当于现在的长江下游地区，为亚热带的北缘（今为南温带）<sup>②</sup> 中国黄河流域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对中国北方蒙古利亚人种南亚型体质特征的消失起了较大的作用；同时历史时期东亚中高纬度移民的南迁，迫使原来黄河流域居民南迁，可能也是构成现在中国南北居民体质特征差异地理特征的原因之一。

## 第二节 历史时期西南地区人种 体质特征的地理变化

西南地区关于古代人种体质特征的资料不多，但我们从片言碎语中仍可耙梳出其大体的演变分布趋势。

在夏商周时期，长江上游地域内居民的体质特征可能本身还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从现在的资料来看，可能在汉代以前四川东西地区人种体质特征已有了区别。有的学者以广汉三星堆遗址中的青铜人像所反映的体质特征来分析古代蜀族的体质特征，其结论认为，三星堆青铜人像所反映的体质特征表明当时成都平原应以蒙古利亚北亚种为主，而以南亚种为次。<sup>③</sup> 有的学者以公元 4 世纪的成汉墓出土的陶俑、铜俑与三星堆青铜人面像比较，发现都有戴平顶微尖的帽子和高眼眶大眼睛特征，进而认为当时成都平原的人种仍具有北方蒙古利亚人种体质特征的遗韵。一般认为三星堆文化中四期文化的时间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周代初年，故三星堆文化遗址所反映的居民体质特征可能主要反映了成都平原上三代（即蚕丛、柏灌和鱼凫）居民的体质特征。

现代看来，后来开明氏王蜀的“古蜀大战”过程实际上是处于长江中游地区的南方蒙古

<sup>①</sup> 明谭《黄河族源语史汉胡同风与长江族源语史华楚遗风》袁少芬主编《汉民族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

<sup>②</sup> 龚高法等《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其生物分布线的推移》，《历史地理》第 5 辑。

<sup>③</sup> 李绍明《古蜀人的来源与族属问题》，《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 年版。

利亚人种西进成都平原的过程。<sup>①</sup> 开明氏王蜀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在春秋早期，即东周早期，故在周代成都平原上的居民体质特征可能变成以蒙古利亚南亚型为主了。以成都指挥街周代遗址中的五具完整的人头骨分析来看，颅骨的形态特征普遍为长颅型，上面低矮，鼻型偏宽，齿槽突颌较明显，与华南地区古代居民的体质特征较接近。<sup>②</sup> 由上可以推测成都指挥街周代遗址的人种可能是开明氏的移民了。

川东地区古代居民的体质特征可能很早便是以蒙古利亚南亚型为主了。从四川巫溪县荆竹坝汉代人骨分析来看，虽然没有确定其所属类型，但其与后来的夔人悬棺中的居民一样有头颅改型的风俗，其人种可能与当时的古越族有一定的关系。而古代越族的体质特征在新石器时代更具有蒙古利亚南亚类型的特征，汉代川东地区的人种也可能更具有蒙古利亚人种南亚类型的特征。<sup>③</sup>

从全国范围来看，先秦时期中国长江流域的居民人种应是以蒙古利亚人种南亚型为主的，即普遍具有一些现代赤道种族的体质特征或新石器时代的南亚型人种的体质特征。但这是与现代这些地区的人种体质特征有区别的。

以上研究表明可能距今 2000 年左右，四川地区东西部地区的居民人种体质特征有微弱的区别。<sup>④</sup> 川西地区的蜀族主要是从中国西北地区的古氏羌系统民族迁徙而来，其体质理应更体现出蒙古利亚北亚型的特征；而从现在民族学和考古学的研究表明，川东地区民族属于古百越族系统，其体质特征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河姆渡遗址居民相似也在情理之中。在历史上，春秋时期开明氏的西进使成都平原上的居民体质特征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呈现出以南亚型为主而兼北亚型的体质特征。考古工作者曾在成都和西昌发现了成汉时期的陶俑，其面部眼裂甚宽，高鼻隆起，阔嘴薄唇，更具有蒙古利亚西北亚型特征。至于其陶俑面部特征与三星堆青铜面具像十分相似，可能与其都是代表北方民族体质特征有关。成汉的建立者李氏虽然是賸人，但其士卒多为西北陕甘地区的氐人，其体质特征自然是以西北氐人为代表了。在成都平原西北地区古代氏羌系统民族中的今天彝、藏民族的先民可能当时已是呈现蒙古利亚北亚型的特征，故直至今日，彝、藏两民族体质仍带有十分明显的西北蒙古利亚人特征，有的人则称其有美洲印第安人种特征。其实，北美印第安人族源在东亚北部，从

① 徐鹏章《古蜀人所处的自然环境与种属问题》成都博物馆编《文物考古研究》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

② 四川大学博物馆、成都市博物馆《成都市指挥街周代遗址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

③ 秦学圣《荆竹坝 M18 号崖棺两具尸骨的鉴定》，《民族学研究》第4辑 陈明芳《中国悬棺葬》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④ 对于川东地区古代人种体质特征的研究还待对古代人骨的进一步分析，如大溪文化遗址中便有大量的人骨。

整体上看与亚洲北极人种最为接近，与北亚人种也相对接近，<sup>①</sup> 确实本身与今彝、藏两民族的族源也不远。

关于川南地区人种的体质特征，我们有宋明时代夔人悬棺中的体质资料结论。据学者对夔人悬棺中十具骨架的观察和测量来看，古代夔人属于蒙古利亚人种。从其颅长、颅指数、颅长高指数、上面高、颧宽、眶指数等方面分析 其居民的体质特征与现在蒙古利亚南亚型相似，而与东亚型存在一定的距离，与东北亚和北亚型有十分明显的差别。<sup>②</sup> 现在学术界认为川南地区民族经历了汉晋夔人、唐宋獠葛、泸戎、元代土獠、明代都掌蛮的发展过程 考虑到川南地区从汉代到明代并无大规模移民外出风潮，笔者是赞成这种发展序列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川南地区在明末以前居民的人种应是以蒙古利亚人种南亚型为主的。

由上来看，中古以前四川地区东西南三个地区的人种已经有了一定的区域特色了。不过，汉晋南北朝时期蜀人的体质特征总的来看相对其它地区可能也有十分明显的特色，故《隋书·地理志》称蜀人“貌多藁陋”。

当然，现在四川地区汉族普遍是以蒙古利亚东亚型人种为主。造成这种人种变化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方面历史时期北方大量移民南下，体现了一种人种地域的空间迁移。研究表明新石器时代中国北方居民曾有过广泛的基因交流，说明新石器时代北方居民曾有过较大规模的的迁移活动。<sup>③</sup> 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表明，总的看来历史时期中国北方移民体现为从西北向东南迁移的大趋势。就四川而言 秦汉、两晋、南北朝、唐宋时期北方移民是最重要的移民，其南迁对四川地区人种可能起了一种渐变的作用。由于川南地区特有的地理位置，开发较慢，故到明代人种仍呈现出比较典型的蒙古利亚南亚型特征。明末清初的战乱和随后的“湖广填四川”给四川中古居民来了个大换血 成为一次大的突变 故现在四川汉族居民从体质特征上来看已非远古和中古的四川居民人种了。本世纪中叶外国学者调查表明，川东地区的汉人的体质特征是与川西地区彝族有较大差别的，“东边的四川人 主要属于短头的傣——马来亚的变种 在颇大程度上类似中部省份 即湖北、湖南、江西等省的居民。<sup>④</sup> 其实这时所指的傣——马来亚变种应是相对于西边彝族的西北亚成分而言，当时川东地区的人种与两湖、江西一样应为蒙古利亚远东种，即蒙古利亚东亚型人种。

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的主体移民是湖广移民、江西移民和陕西移民 分别占移民的

① (苏)雅·雅·罗金斯基等《人类学》王培英译 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第 529 页。

② 秦学圣《夔人悬棺十具骨架的观察与测量》,《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朱泓《“夔人悬棺”颅骨的人种学分析》,《南方民族考古》第 1 辑。

③ 陈德珍《中国新石器时代北方居民体质类型及其继承关系》,《人类学学报》1986年第 2 期。

④ (苏)尼·尼·切博克萨罗夫《有关中国南方民族的人类学研究资料述评》,马贤伦译,《贵州民族研究》1987年第 4 期。

37%、23%和 12%左右,<sup>①</sup>而湖广居民由于所处的地理区位的因素,得开发之先。明代陕西移民最先迁入四川地区,使四川地区首先受北方移民的影响,其居民自然以北方人的体质特征为主。同时,四川人种体质特征的变化与环境也有关系。历史时期四川地区气候比现在要湿润温暖些,这种温暖而湿润的气候会对当时的人种变化产生一定的影响,后来气候日趋干冷,对居民的体质特征会不会有影响呢?笔者不敢妄言,只提出问题供有关专家思考。不过韩康信、潘其凤认为:“更为可能的是这些新石器时代居民继续了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祖先的性状。而这些性状,如阔鼻、齿槽突颌等,大概比较适宜于热带和亚热带的气候条件,以致在现代的低纬度的地区还普遍保存着。相比之下,亚洲北部的自然条件更严酷,变化更为急剧,在这种自然条件的选择压力下,体质形态的适应变化较大,形成了一般所指的典型的蒙古人种特征。”<sup>②</sup>笔者对此是十分赞同的。这样看来,食物的改进、自然环境变化、社会的变化,可能对人的体质特征演变产生一定的影响。

云贵地区在元明以前一直呈现“夷多汉少”的局面。但由于历史时期云贵地区少数民族迁徙变化甚大,而现在又缺乏元以前的居民骨骼的分析材料,我们只能主要以现在对各民族体质特征的研究成果,结合历史文献的记载来分析其人种发展的大势了。

明代以后云贵地区由于大量军事屯垦移民和商业移民的进入,改变了“夷多汉少”的局面,形成新的民族分布格局。这个时期汉族移民主要在沿交通线两侧,而以江南、江西和湖广籍移民为主。这个时期云贵地区的汉族移民可能应主要以蒙古利亚东亚型为主。

现在西南地区各民族的体质特征仍十分复杂。现在人种的聚类分析表明,中国现代人的体质特征可分成南北两大类型。西南地区的汉族普遍属于南部类型。共同的特征是:水平型眼裂较多,眼裂开程度较宽,通常无蒙古褶,鼻根较低,鼻翼发育显著,红唇较厚,头形略长且偏窄,脸型低而窄,身材较短。<sup>③</sup>从聚类分析来看,四川汉族与贵州汉族的体质特征更为接近,而与云南汉族体质特征相对较远。比如云南汉族的体形综合指数居全国第 21 位,而四川居第 25 位,贵州居第 28 位。但从历史移民的研究来看,现代云南汉族与贵州汉族可能更接近一些,因现在云贵地区汉族主要是以明代军屯、民屯、经商和开矿的江南籍、江西和湖广籍人为主,四川则主要是明末清初的湖广移民为主。解释这种悖论只能说是在自然环境影响下移民与当地土著通婚遗传的结果。如云南地区日照指数高,是形成云南汉族和少数民族身高高于贵州和四川的汉人和少数民族的主要因素。

研究表明,中国北方西北地区 B 型血的分布最高,东南地区 O 型血的分布最高,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南地区 A 型血的分布最高。这表明从现在人种来看,长江中上游的居民有

① 蓝勇《清代四川土著与移民的地理特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期。

② 韩康信等《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③ 张振标《现代中国人体质特征及其类型分析》,《人类学学报》1988年第4期。

更多的亲缘关系。从遗传距离来看 四川、湖北、安徽、浙江、江西、湖南、贵州、云南为相对接近的人种群体。<sup>①</sup>从近 600 多年长江流域移民趋势来看，湖广人主要来自江西，而四川人主要来自湖广，云南、贵州则以江南和江西籍移民为主，这种迁移和分布大势自然是与血型的分布相吻合的。这种分布最终说明现代西南地区的汉人主要是近 600 多年来迁自长江中下游地区，故其人种总的体质特征应是以蒙古利亚东亚类型为主。只是由于受西南地区中古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体质特征的影响，才使川南、川西地区汉人在体质特征上与川东略有差异。

民族学和民族史的研究表明，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分成氏羌系统、百越系统、苗瑶系统和百濮系统，其分布分别居于西南的西部、东部和西南部，体现了历史时期其迁徙的基本路线。从现代中国少数民族体质聚类分析结果来看，也分成南北两类，但在西南地区可能更复杂一些。有研究表明，在中国西南地区还有一个彝藏走廊聚类群，以川西北和甘南地区的藏、彝族为中心。<sup>②</sup>这两个民族的体质特征不是与今西南地区其他少数民族的体质特征同属蒙古利亚东亚型和南亚型，而更接近于西北亚型，有的学者称其为亚美利安人种的美洲人。如藏族的体质特征聚类分析与我国西北少数民族 蒙古、维吾尔 接近 与汉人相比 同北方陕西汉人和河北汉人更接近。<sup>③</sup>遗传拓扑学研究表明，我国彝、藏民族的遗传位置位于中国的西北的北部地区。<sup>④</sup>从民族源流学研究来看，西南地区早在旧石器时代便有土著居民生存，现在彝藏民族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属于古代氏羌系统民族的分支，其在历史时期有一个从北向南的迁徙过程，故其民族形成沿横断山脉纵列河谷从北向南分布的特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表明，现在彝族的祖先的一个分支“鬻人”便是深处中亚的斯基泰“塞人”其早在汉晋以前便迁入了西南地区 其体质特征有“高鼻深目”的特点。<sup>⑤</sup>以前人们认为的四川芦山县的汉代“佛像”笔者以为实际上应是彝族先民的形象。直到明清时期 据嘉靖《贵州通志》、田汝成《炎徼纪闻》等记载 当时的“罗罗”的形象是“深目长身 黑面白齿”。四川历史上的所谓“黑彝”的体质特征便应是这种组合成分的遗留。由于南北自然环境和民族聚居的差异，同是氏羌系统的民族在体质特征上可能也有差异，即可能呈现由北向南从接近于氏羌系统蒙古利亚西北亚型体质特征，向古代孟高棉的壮傣蒙古利亚南亚型过渡的分布状况。<sup>⑥</sup>

陈雅勇《中国人 ABO 型血型分布》，《遗传》1982 年 4 卷第 2 期

① 黎彦才等《中国 33 个少数民族体质特征的比较研究》，《人类学学报》1993 年第 1 期。

② 张振标《藏族人的体质特征》，《人类学学报》1985 年第 3 期。

③ 谭茜《中国 21 个人群的遗传拓扑学分析》，《人类学学报》1993 年第 1 期。

④ 张增琪《中国西南民族考古》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⑤ 黎彦才等《中国 33 个少数民族体质特征比较研究》，《人类学学报》1993 年第 1 期。

总的来看，现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的体质特征以蒙古利亚东亚类型和南亚类型为主，在横断山脉走廊里的藏族和北面的彝族体质特征更有一些西北亚型的特点，如较狭鼻形、较高身高和波状发；而南面的傣族、壮族等民族的体质特征更带有蒙古利亚人种南亚型的特点；其他大部分民族则多为兼有蒙古利亚人种东亚型与南亚型特征的居民。

### 第三节 历史时期西南少数民族源流与语言族属

现在民族学界一般将历史时期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分属于氏羌系统、百越系统、百濮系统和苗瑶系统，其在语言上分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和汉藏语系苗瑶语族。当然，从西南地区的大量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来看，西南地区肯定是有许多土著居民的。我们知道人种与民族的关系是复杂的，一个人种包含众多民族，同样一个民族也可能由多个人种组成。要十分准确地分析民族源流、民族语属与人种的关系是较困难的。特别是历史时期的民族与人种的关系更加复杂，民族在不断地分化融合，人种也在随之杂交演化，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处于完全正相关状态下。这样，笔者只是根据近几十年来人类学工作者对现代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和汉族体质特征的调查资料，结合目前民族史学界对于西南民族源流史的考证成果，综合成下表。

表 1-1 西南地区古代民族源流、人种及语言族属表

现代语言语族	现代民族与人种亚种	古代民族系统
汉藏语系藏缅语族	彝语支——彝族(西北亚与南亚过渡型)、哈尼族(南亚型)、纳西族(东亚型)、傈僳族(东亚型)、拉祜族、基诺族(南亚型)、碧江怒族 白语支——白语支(东亚型) 景颇语支——景颇族(东亚与南亚过渡型)、独龙族、贡山怒族 藏语支——藏族(西北亚与南亚过渡型)、普米族 缅语支——阿昌族(东亚型)	氏羌系统民族
汉藏语系壮侗语族 (侗傣语族)	傣语支——傣族(南亚型) 壮语支——壮族(南亚型)、布依族(南亚型) 水语支——水族(南亚型)	百越系统民族

汉藏语系苗瑶语族	苗语支——苗族(南亚型) 瑶语支——瑶族(南亚型)	三苗九黎系统
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	佤德语支——佤族、布朗族(南亚型)、德昂族、崩龙族	百濮系统民族
汉藏语系汉语族	中国以长江为界分成北方汉人和南方汉人。西南三省汉人多为东亚型。但川黔两省汉人聚类更近,与南方汉人更近;云南汉人也属南方汉人,但聚类更近北方汉人。	中原齐民

资料出处 罗常培、傅懋勳《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概况》(《中国语文》1954年第3期 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人类学会编《中国八个少数民族体质调查报告》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张振标《藏族人的体质特征》,《人类学学报》1985年第4期 李明等《云南景颇族的体质特征》,《人类学学报》1989年第1期 张振标等《广西壮族体质特征》,《人类学学报》1983年第2期 罗远才等《湖南土家族的体质特征》,《人类学学报》1985年第4期 张振标《现代中国人体质特征及类型的分析》,《人类学学报》1988年第4期 黎彦才等《中国33个少数民族体质特征的比较研究》,《人类学学报》1993年第1期 刘冠豪等《傣族的体质特征研究》,《人类学学报》1990年第2期 刘冠豪等《云南纳西族的体质特征研究》,《人类学学报》1992年第1期 李明等《云南阿昌族的体质特征研究》,《人类学学报》1992年第1期 李培春等《水族的体质特征研究》,《人类学学报》1994年第1期 梁明康《贵州仡佬族体质特征》,《人类学学报》1994年第1期 余发昌等《云南苗族的体质特征研究》,《人类学学报》,1994年第4期。

笔者治学之始是以西南民族史为入门的,当时对如此纷繁的民族源流考证结论甚感疑惑!十多年以后才感到,民族历史源流的考证分歧最大,主要是由于我们的研究方法问题。那种完全基于历史文献耙梳和训诂的研究方法,往往会使人陷入望文生义、望音生义和以传说证史的误区。如果没有系统的原则基础,对模糊历史文献进行推理的信度是值得怀疑的。这种方法可能对每一个小问题的考证似乎占有根据,但最终的结论仍是众说纷纭,令人疑窦丛生。

我们知道,人类的体质特征和语言族属相对于民族源流的分化组合来说是最稳定的。这样,我们用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研究结论,结合考古学和现代人类学的资料去分析民族源流及其民族文化,探索其民族源流的地理特征,便可能更准确和全面了。

从表 1—1 中的民族源流、体质特征和语言族属的分布来看,地域特色是十分明显的(参看地图 1—1)。百濮系统、三苗九黎系统和百濮系统的民族族源在中国南方,故体质特征上明显多属于蒙古利亚人种南亚型。从历史时期这些民族的迁移来看,主要是在中国南方地区的东西间迁移,在西南地区主要表现为由东向西的迁移,因影响体质特征的地理环境变化幅度不大,可能体质特征在历史时期是相对较为稳定的。但氏羌系统民族在历史上曾有一个沿横断山脉民族走廊从北向南迁徙的过程,如历史上的彝、藏、缅、阿昌、傣、哈尼、景颇、

白族的先民都不同程度上有这个过程，使这些民族在体质上仍有一种共性可寻。由于这种迁徙的过程十分复杂，迁徙所跨的纬度很大，从温带跨越亚热带一直到热带地区，长期的环境影响和与其他土著民族的杂交，使这些民族在体质特征上又体现出十分明显的区域差异，有其规律可寻。这些氏羌系统民族体质特征从北向南呈现西北亚型、东亚型和南亚型的阶梯分布，最北部的彝、藏民族体质特征上带有十分明显的美洲印第安人的特征，略东的羌族和再南的纳西族、傣族、白族却呈现为东亚型，再南的哈尼族、基诺族则呈现为南亚型。其中阿昌族分布靠南，但其体质特征却是东亚型，可能与历史记载阿昌族的祖先唐代以前仍居住在滇西北地区有关。<sup>①</sup>

从有关文献记载、考古资料、现代人类遗传学和体质学资料来看，这些民族有西北民族的遗传基因，民族确有从北向南迁移的文献记载，现在在语言上又属藏缅语族，共性是十分明显的。而我们可以认为这些民族体质特征的差异是在从北向南迁移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既有环境的因素，即迁入地环境与迁出地环境大异的因素，可能也有与当地土著长期通婚的原因。张增琪先生认为彝族是一个复合的民族，<sup>②</sup>我是十分赞同的。从体质特征上来看，彝族的轴心应靠北一些。以往的外国学者认为彝族有“高加索人种”的一些特征，科学地看是有其一定道理的。从现在对彝族体质人类学、遗传拓扑学的研究表明，彝族的遗传位置在中国西北的北部地区，无疑是对以上结论最好的证明。彝族中存在“黑彝”和“白彝”之分，从体质特征上讲，“黑彝”更有明显的西北亚人种的特征，而历史上“黑彝”多以奴隶主的身份出现，可能就是彝族最早的主体民族核心，而“白彝”可能是在后来的迁徙过程中融合进去的。以往史学界有水壮同源和苗壮同域之说，从血型调查的聚类分布来看，水壮、苗壮的聚类分布确实十分接近，也是十分有说服力的。<sup>③</sup>

① 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3页。《阿昌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② 张增琪《中国西南民族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8页～第317页。

③ 韦业华《贵州省仡佬族、水族、广西壮族 ABO血型调查》，《人类学学报》1995年14卷第1期。

## 第二章

# 考古学意义下的西南文化地理

从旧石器时代到秦汉时期的西南地区的文化地理文献资料十分有限，但考古学却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可信度十分高的资料。这里需要说明的两点是，很长一段时期里，学术界将区域文化的研究只局限于考古学所反映出的汉代以前的物质文化，如研究巴蜀文化、滇文化、黔文化便只是指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这个文化的意义太狭窄。至于汉到现在的 2000 多年里大量文献和考古资料反映的物质和意识形态的文化现象却少有人系统研究，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我们应树立一种观点，即考古学资料所反映的文化地理现象是相对的。因为我们知道，由于各种原因的制约，我们目前的考古发掘主要还是以一种抢救性的发掘为主。也就是说考古发掘本身在地域上是处于一种随机状态下的。由于有些类考古遗址的点本身较少，所反映的误差较大，因此其所反映的空间文化的地理特征的信度不是太高。当然应该看到，这些年的文物普查对于我们提高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研究的信度起了十分大的作用。

### 第一节 石器时代的西南文化地理

#### 一 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布

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现较多，如四川地区就有资阳鲤鱼桥、成都羊子山、汉源富林镇、铜梁西郊水库、巫山龙骨坡、筠连镇州拱猪洞、重庆马王场、黔江红土湾、资阳九曲河、攀枝花回龙湾和蓆草坪等遗址。它们广泛分布于四川各地，尤以盆地中部、南部和川东

地区为多。云南地区先后在元谋、禄丰、西畴、丽江、宜良、呈贡、丘北、保山、施甸、沧源、河口、马关、罗平、路南、镇雄、镇康等地发现了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古人类化石，以滇南、滇中、滇西北分布较广。贵州地区先后在黔西、桐梓、水城、威宁、安龙、织金、六枝、兴义、普定、长顺、兴仁发现了古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黔西和黔南地区。<sup>①</sup> 具体而言，一般将我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文化遗址分成四种类型，即云贵高原型、黔南低山型（以兴义猫猫洞为代表）、四川盆地型（以铜梁遗址为代表）、川西高原型（以汉源富林为代表）<sup>②</sup>（参看地图 2—1）有的研究者指出，旧石器时代四川已经形成四个区域性文化类型，即大渡河流域的富林文化、岷江流域的成都羊子山遗址文化、沱江流域的资阳鲤鱼桥文化、涪江流域的铜梁文化，<sup>③</sup> 可见早在旧石器时代四川地区的区域文化已经有了雏形。

目前在西南地区发现最的古老的人类是距今 200 万年左右的“巫山猿人”和距今 170 万年的“元谋人”，这说明西南地区也是古人类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另外我们还在四川资阳和筠连发现了更新世晚期的人类化石。不难看出，早在旧石器时代，我们土著的先民便在西南这块土地上创造了辉煌的石器文化，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区域文化。就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来看，总的来说，中国西南旧石器时代打制石器技术偏于保守，器形单纯，缺乏手斧、切割器、挖掘器及标枪、矛头、箭镞等锋利器，骨角器水平较高，已开始进行磨制。造成这种特点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西南地区自然环境优越，茂密的森林向人们提供了坚木和硬竹，人们用这些材料制成坚刃锋利器替代了石器职能，丰富的动物骨骼又为骨器利用提供了条件。

## 二 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地理特征

中国西南新石器时代遗址在整个西南地区都有大量发现。截止于本世纪 80 年代不完全统计，中国西南地区至少有 151 个县市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采集点更是不胜枚举。如果加上采集点，整个四川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采集点至少在 200 个以上。以下是西南三省目前有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县名目录。

四川地区：成都、新津、蒲江、崇庆、乐山、合川、盐源、喜德、雅安、忠县、巫山、万县、云阳、奉节、石棉、阆中、南部、南充、普格、荥经、夹江、洪雅、西昌、绵阳、芦山、天全、木里、黑水、武胜、峨边、广汉、巫溪、长寿、江北、巴县、江津、重庆、冕宁、德阳、米易、会理、渡口、宜宾、高县、

<sup>①</sup> 以上材料主要出自赵殿增《四川三十年考古收获》，《四川文物》1989年第5期；李昆声《云南文物考古三十年》，《云南文物》第25辑，1989年6月；宋世坤《建国以来贵州考古主要收获》，《贵州文物》1984年第2期。同时以《考古学报》、《考古》、《文物》、《云南文物》、《四川文物》、《贵州文物》的有关资料作了增补。

<sup>②</sup> 董恩正《略论我国西南地区的史前考古》，《四川文物》1985年第2期。

<sup>③</sup> 段渝《四川通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册第3页。

筠连、汉源、理县、汶川、南江、渠县、万源、通江、巴中、广元、盐边等 55 个县市。

云南地区 绥江、大关、昭通、鲁甸、威信、宣威、寻甸、马龙、江川、金平、麻栗坡、昆明、富民、安宁、呈贡、晋宁、禄丰、永仁、元谋、大姚、姚安、祥云、弥渡、南涧、下关、大理、宾川、洱海、云龙、剑川、华坪、永胜、宜良、龙陵、瑞丽、元江、河口、思茅、砚山、马关、富宁、文山、曲靖、通海、宁蒗、中甸、德钦、贡山、维西、福贡、元阳、凤庆、保山、腾冲、梁河、潞西、施甸、耿马、沧源、双江、澜沧、孟连、勐海、景洪、镇沅、普洱、临沧、景东、昌宁、个旧等 70 个县市。

贵州地区 毕节、赫章、威宁、兴仁、望谟、水城、盘县、平坝、普安、大方、织金、安顺、清镇、贵阳、长顺、金沙、桐梓、赤水、铜仁、松桃、沿河、锦屏、湄潭、绥阳、纳雍、黔西等 26 个县市。<sup>①</sup>

据考古学者们的长期研究表明：从新石器时代起，西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便充满十分鲜明的地方特色，地区以内也有了色彩斑斓而特色各异的文化（参见图 2—2）。

(1) 川中盆地文化区：以三星堆文化遗址为代表。陶器以灰陶为主，主要以下腹内收的小平底、尖底器为特色。常出土有小平底罐、钵、长柄豆、盂、鸟头形器和圈足盘等器皿。这种文化一般被认为与早期巴蜀青铜文化有承袭的关系，称为巴蜀早期文化。

(2) 青衣江流域文化区：主要是指今雅安、夹江、乐山、峨嵋青衣江流域的文化类型。以双肩石器与细石器、尖底陶器共存为其特色。其双肩石器一般认为源于西北甘青文化，与云南云县、忙怀、福贡双肩石器同源。

(3) 川东峡谷文化区：以巫山大溪和忠县簪井沟遗址为典型代表。陶器以红陶为主，筒形瓶、角状尖底瓶、曲腹杯、高圈足深腹豆、三足罐为主要陶器，其中以圈足器尤其多。工具以长条形巨形石斧和磨制精细的圭形石为典型工具，也有少量有肩石器出土。这种文化类型一般又被习惯称为大溪文化。

(4) 川东嘉陵江文化区：以江津王爷庙、巴县干溪沟、合川沙梁子为代表。工具打制石器多于磨制石器，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

(5) 川西北高原区 以理县建山寨和汶川姜维城遗址为代表。石斧、石锛以条形为主 陶器以手制为主，有泥质灰陶、泥质红陶、夹砂灰陶。在其区域内发现的彩陶与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彩陶十分相似。

(6) 大墩子—礼州文化：其文化以云南元谋和四川西昌礼州文化为典型代表。其文化中，工具以弧背直刃的半月形石刀为主要特征，盘状砍砸器较多。陶器盛行带流的壶、瓶、罐、钵 但礼州文化以夹砂红陶为主 大墩子以夹砂灰陶为主。

<sup>①</sup> 以上材料主要出自赵殿增《四川三十年考古收获》，《四川文物》1989年第5期 李昆声《云南文物考古三十年》，《云南文物》第25辑，1989年6月 宋世坤《建国以来贵州考古主要收获》，《贵州文物》1984年第2期。同时以《考古学报》、《考古》、《文物》、《云南文物》、《四川文物》、《贵州文物》的有关资料作了增补。

元谋大墩子文化包括永仁菜园子、禄丰、姚安等处，为金沙江中游的文化区。工具多以鹅卵石为原料，形制多为圆角梯形、圆角长条形石斧和石锛、新月形穿孔石刀为典型器物。陶器特点是多侈口、小平底、鼓腹，极少有圈足器和带耳器。建筑以长方形地面木结构为主，也有半地穴式圆形房屋。墓式以竖穴土坑墓为主，也有瓮棺葬和圆形墓。遗址中有炭化粳稻出土。西昌礼州为安宁河流域文化区。工具以典型的梯形石斧、穿孔半月形石刀为代表。陶器多小口瓶和平底器，壶多带流，带把罐、桶形器、双耳罐颇具特色。

(7) 洱海—白羊村文化区 主要分布在滇西大理一带的下关、大理、宾川、剑川和祥云等处，以宾川白羊村最为典型。其工具以长条形石斧、石锛、新月形穿孔石刀和磨制精制的石铲为主。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以陶罐、圜底钵、匜、浅腹大平底陶器为主。建筑以地面木结构建筑为主。墓葬以竖穴土坑墓和瓮棺葬为主。有稻壳和稻秆出土。

(8) 滇池文化区 主要是指今昆明、安宁、呈贡、江川、晋宁的文化区。遗址多贝丘遗址。典型的工具为有肩石斧、有段石锛。陶器以手制泥质红陶居多，器上多谷壳痕迹。器形以侈口罐、直口罐、带流罐、盆、钵、釜、圈足器、纺轮和网坠为主。

(9) 滇东北和黔西北文化区 主要是指今昭通、大关、鲁甸、威信、绥江、威宁、毕节、赫章等地的新石器文化。滇东北区域内只有昭通闸心坝和鲁甸马厂经过试掘。其工具以梯形和长条形石锛、新月形和长条形石刀为主，也有肩化不明显的有段石锛。滇东北陶器以泥质灰陶、橙黄陶、夹砂灰陶为主，也出土有磨制十分精细的黑陶。陶器器形以单耳细颈平底小瓶和单耳侈口小罐为典型。黔西北地区工具以长方形石锛为多，有孔石刀、有肩石锛也有出土。陶器以夹砂红陶和灰陶为主，也出土有磨制十分精细的黑陶。

(10) 澜沧江中上游文化区：主要是指今天云县、景东、福贡、澜沧、龙陵县境的文化区。其工具原料多鹅卵石，以打制居多，器形以硕大的钺、靴形和长条形有肩石斧为典型特征，有甘青地区双肩石器的影子。陶器多为罐，以夹砂灰陶和红陶为主。

(11) 滇南和黔西南文化区：包括滇西南西双版纳、德宏州、思茅地区和滇东南的文山州、玉溪地区和黔西南地区。工具主要是以江边天然砾石打磨而成，只局部磨光。器形以通体磨光的有肩和有段石斧和石锛、靴形石斧和石锛为典型器物。东面的盘县、兴义、望谟、河口、元江、麻栗坡、昌宁、潞西、腾冲多有肩和有段的石斧和石锛，而西边的麻栗坡靴形石斧、瑞丽的梯形石斧和景洪、勐海、澜沧、普洱等地手斧也占一定比例。这种趋势反映了作为东南沿海文化代表的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在这个文化区内从东向西分布越来越少。

(12) 黔中文化区 包括贵阳、清镇、平坝等地文化遗址，以平坝飞虎山最为典型。陶器以夹细砂灰陶为主，也发现有一乳黄色彩陶。工具以斜刃长方形锛为主要特征。<sup>①</sup>

<sup>①</sup> 以上分区主要参考赵殿增《巴蜀原始文化的研究》徐中舒《巴蜀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刘小兵《滇文化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从西南地区 12 种新石器时代文化区的地理分布来看,除了具有其本身的文化地理特色外,显然受到了东南沿海文化和西北内陆文化的相互影响。受地理上的距离递减规律的影响,滇西北、洱海、金沙江大墩子—礼州、川西北文化区与我国西北内陆的新石器文化有较多的关系,呈现沿横断山脉纵列河谷民族走廊从北向南分布的大势。其文化与甘青地区的寺洼和卡约文化关系密切。如长方形地面式住房、半地穴式住房、半月形穿孔石刀、瓮棺葬、以多罐钵盆的陶器组合、多圜底器、陶纹以绳纹和划纹为主都可说明此特征。在滇西的云县、福贡、忙怀和川西地区的雅安地区分布着一种较硕大的有肩石器,源于西北地区,有的学者认为源于西北地区齐家文化的有肩石铲。<sup>①</sup>这种新石器文化的特色一直延续到青铜时代,该地区仍以石棺葬、大石墓、“安佛拉式”陶双耳和单耳罐以及盛行火葬为特色。而滇南、滇池、滇西南、滇东南、黔西南、黔西和滇东北地区的文化却明显带有东南沿海百越文化的特色。如工具中的有段石锛、有肩石斧和有肩有段石锛较多。陶器以夹砂拍印绳纹粗陶为代表。普遍种水稻,干栏式建筑较普遍,洞穴和贝丘台地遗址较多。四川地区处西南地区北面,由于地理位置相对与中原接近些,故其文化除本身多以小平底器、尖底器、长柄豆、盃为主外,受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影响相对要强些,如无肩长条石斧、有柄石锄等。但川东地区也有有肩石器出土,有的学者认为其与长江流域有肩石器同属一个系统,表明川东地区石器文化又与百越系统文化有相似之处,或有一定的联系。

总的来看,西南地区的北部和西部受东南文化的影响相对少些,而东部和南部就要明显得多。如黔南盘县和威宁的有段石锛肩十分明显,而其西北的滇东北的有段石锛肩不是十分明显。再者,较西边的德宏、保山一带古代氏羌、百越和百濮民族交汇的地区,文化类型较为复杂,故其有肩石斧的肩不是十分明显。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现代人类学和地理学研究结论表明,地理环境本身是造就文化特色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域内可以独立地产生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而两个地理环境相似的区域完全可能各自独立地产生两个完全相似的文化。这样我们便不能完全以一种绝对联系的文化观生硬地去寻找文化源流。中国西南地区南部和东部多河川湖泊,气候相对湿润,与东南地区地理环境有相似之处,再加上喀斯特地形十分突出,是形成洞穴文化、贝丘的台地遗址、种植水稻、干栏式建筑的主要因素。我们还不能简单地说这一定是受东南沿海文化的影响。即使是受其影响,也很大程度是因为受当地的地理环境的影响所致,因为以上文化现象的传入是很难在干燥的西北内陆生根的。同样,西南地区的横断山脉地区由于干燥,处新构造地带,岩石深切成片,为其大石墓、石棺葬、半地穴式和地面式木结构建筑的产生奠定了环境基础。

<sup>①</sup> 王海平《我国西南地区有肩石器的研究》,《四川文物》1989年第3期。

## 第二节 西南地区青铜时代的考古文化地理

### 一 青铜时代的巴蜀文化地理

这里所指的巴蜀青铜文化是指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的巴蜀文化，其时间跨度较长，一般将其分成以下三个阶段，即巴蜀早期文化、早期巴蜀文化和晚期巴蜀文化，各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从目前的资料而言，新石器时代的巴蜀早期文化与早期巴蜀文化的分界并不是十分明显，故我们多只谈早期巴蜀文化。

一般认为，早期巴蜀文化为蜀族所创造，时间为蚕丛、鱼凫到杜宇王朝时期，正是中原的夏商周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化特征以葬式为不规则的浅穴土坑墓为主；陶器以尖底盏、高脚豆、小平底罐（钵）、尖底罐（钵）、瘦长袋足盃、角形尖底杯、鸟头形长柄豆为主；兵器以扁平长援戈、圆形空首钺、扁平柳叶短剑为主；青铜容器以罍、尊为主，有独特的人头和人面青铜组合像。

晚期巴蜀文化是巴蜀民族文化融合的文化，这种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尤以船棺葬、柳叶剑、小口圆底器、烟荷包式钺、铜印章及其之上的巴蜀图语为特色。具体而言，墓葬形式较复杂，有船棺葬、独木棺式船棺土坑葬、大型木椁土坑墓、木板土坑葬、瓮棺土葬等，而以船棺葬为此期一大特色。陶器以球形、小口圆底罐、绳纹圆底盃、喇叭状小圈足豆、纺铜式陶釜甑为主；兵器以扁茎无格柳叶形剑、烟荷包式钺（又叫舌形钺、圆刃折腰钺）、大三角援形戈、短铍式弓耳矛为特色。铜容器以辫索纹竖环耳釜、釜、甑为其特色，青铜器方面还以较多的巴蜀图章及青铜器上的巴蜀图语，如手心、花蒂、蝉和虎为其特色。

从地理分布来看，巴蜀文化分布十分广。早期文化西起雅安，东到宜昌地区，北到绵阳、陕南地区，南至长江沿岸，以广汉中兴场、汉源背后山、雅安斗胆村（以上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三星堆上层、新繁水观音、成都十二桥、忠县簪井沟为代表。后期巴蜀文化在四川盆地中有成都和渝涪、重庆、涪陵两个中心，以新都蜀王墓和涪陵巴王墓为代表。晚期巴蜀文化分成川西型、川东型和川南型。

川西型葬式以土坑船棺葬为其特色，容器中多鼎，有尖底奩形器，铜器多厚重，有北方草原的风格，剑形制较多，一般敦重短窄，多小飞剑。

川东型葬式以崖葬船棺（三峡地区）、土葬船棺（巴县冬笋坝）和土葬（小田溪）组合为主。铜器中多虎纽錡于、编钟，剑扁平而长，铜器轻薄，有南方民族的风格，青铜图语中多虎纹。

川南型葬式以土坑葬为主，器物形制多为巴蜀式的，但更古朴，更带有早期巴蜀文化的

特征。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在峨嵋山符溪、键为金井、乐山金口河、彭山蔡家山、洪雅金釜乡、宜宾化工厂、高县文江乡、珙县沐滩和合作乡、云南昭通水富县发现了许多巴蜀青铜文化遗址和文物，时间在战国到西汉时期，有的学者提出这正是秦灭巴蜀后蜀人南迁的遗址。<sup>①</sup>由于蜀人本身也受北方文化的影响，故从叙南六属的珙县出土文物来看，也还有双耳陶罐，也有鼎出土，川南型文化中有中原文化的因素。当然也有人据云南水富县张滩出土的巴式柳叶剑、烟荷包式钺、巴蜀符号印章、动物形章纽等文物，认为这些文物为巴人南迁所遗留。<sup>②</sup>先秦时期，川南地区为夔人所居，可能是秦至西汉时期带有一些中原文化色彩的蜀人和巴人南迁，与当地夔人的文化相融合，便形成较为古朴的巴蜀式青铜文化。

## 二 横断山脉六江文化分区

所谓六江文化主要是指中国西南地区由横断山脉纵列河谷切割而成的六条大江流域地区的文化，即大渡河、岷江上游、雅砻江、金沙江上游、怒江上游、澜沧江上游地区。这个地区从地理环境来看，山岭纵列，切割高深，气候高寒，而部分平坝河谷地区又呈干热状态。历史时期，这些横断山脉纵列河谷为氏羌民族系统从北向南迁徙的大走廊，民族众多，文化丰富多彩而有特色。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传统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影响，本地区文化与各种岩石关系密切，陶器以“安佛拉式”罐为特色。也有的学者将这种文化称为“萝葡砦文化”。<sup>③</sup>

(1) 川西北冉·駘文化—石棺葬文化。此文化的区域主要是指今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境内，为古代冉·駘民族聚居地区，汉代于此置汶山郡。此文化的典型遗址主要集中在岷江上游的理县、汶川、茂汶的沿河两岸。其文化的特色以石棺葬和石碉楼为特色。

石棺葬系用板岩或片麻岩打制成长方形的石板，嵌成平面成梯形的石棺（头大足小），时间上多为战国到西汉时期。碉楼系古代冉·駘民族的居住建筑，早在秦汉时便“累石为室”，称为“邛笼”，至今仍是羌族的重要民居。这种以石居室为特色的大石文化到明清时期仍十分明显，当时岷江两岸不十里就有石堡，往往数百里相连，蔚为壮观。

其文化中陶器以一种桃核形口沿的大双耳陶罐（即安佛拉式）为其特色。陶罐内多稷类作物和麻布的痕迹。

冉·駘文化与蜀文化的中心相近，故其文化中也有部分蜀文化的因素。如一些小口圆底罐、铜钺、铜釜都是巴蜀文化中所常见的，茂汶石彭乡还出土有典型的巴蜀式青铜扁茎无格柳叶形剑。但其文化更明显受甘青地区的寺洼和卡约文化影响，如火葬、陶双耳罐（安佛拉

① 唐长寿《川南蜀人墓葬和蜀国南疆》，《四川文物》1995年第4期。

② 丁长芬《从昭通巴蜀土坑墓看巴人南迁》，《四川文物》1996年第3期。

③ 王涵《我国西南地区一种新的青铜文化》（上、下），《云南文物》第16辑。